

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

□季春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这一决定民族命运的伟大反侵略战争中,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洞见与强烈的使命担当,展现出了卓越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战略决策的全局性运筹、理论创新的突破性建构与实践路径的能动性开拓中,深刻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格局。在战略决策方面,毛泽东以持久战理论破解了战争困局;在理论创新方面,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应了时代课题;在实践路径方面,毛泽东以群众路线开辟了胜利之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所展现出的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方位、增强历史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毛泽东;历史主动精神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5)04-0052-10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洞见与强烈的使命担当,展现出了卓越的历史主动精神。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不是被动回应时局,而是以主体性自觉穿透历史迷雾,在战略决策的全局性运筹、理论创新的突破性建构与实践路径的能动性开拓中,深刻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格局,为维护国家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提供了划时代的实践范本与哲学启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对于“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1]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一、战略决策:以持久战理论破解战争困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持久战理论破解战争困局的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把握与主动驾驭,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战争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

(一)科学预见战争进程:基于历史规律的战略体系建构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为理论武器,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科学预见了战争进程,构建起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战略体系,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

[收稿日期]2025-06-23

[作者简介]季春芳(1982—),女,安徽无为,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3VLS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战争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剖析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根源。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2]P447},将抗日战争置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双重坐标系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日本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掠夺资源,开拓市场,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毛泽东从根本上解释了抗日战争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为中国人民认清敌人面目、坚定抗战决心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抗日战争的性质,毛泽东有着明确界定:日本侵华战争在本质上具有退步性、野蛮性,中国抗日战争在本质上具有进步性和正义性^{[2]P448-449}。日本的残酷侵略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尊严。毛泽东对战争性质的正确判断,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使全国人民更加坚定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正义而战。

2. 战争阶段论的系统性建构

基于对矛盾运动规律的把握,毛泽东将抗日战争科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特征与任务作出精准预判。在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将利用其军事优势展开进攻,但中国可以通过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事实证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正面战场的抵抗,以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3]P19}在敌后的展开,成功迟滞了日军进攻节奏,打破了其“三个月灭亡中国”^{[4]P6}的妄想。战略相持阶段被毛泽东视为“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2]P465}。他预见此阶段日军将停止战略进攻,转而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5]P520}策略,而中国则需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以防止分裂。历史证明,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不得不调整战略,敌后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通过“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使日军陷入“治安战”泥潭。1940年百团大战的胜利,更标志着敌后游击战争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直接影响了战争进程。战略反攻阶段,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好转与

中国抗日力量的壮大,中国逐步转入反攻,最终取得战争胜利。1944年初起,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发起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全面反攻,中国彻底击溃日本侵略者。

3. 理论批判的主动实践

全面抗战初期,国内弥漫着两种极端且有害的思想,即产生妥协倾向的“亡国论”与产生轻敌倾向的“速胜论”。面对这一思想混乱,毛泽东以理论批判为武器,主动承担起统一全党全国抗战意志的历史任务。针对“亡国论”,毛泽东指出:“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2]P458}。针对“速胜论”,毛泽东强调:“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2]P458}。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毛泽东指出,日本虽是强国,军事、经济和组织力强大,但它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退步的,失道寡助,且其国小人少,资源匮乏,经不起长期战争消耗;中国虽是弱国,军事装备和经济实力相对落后,但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备支持持久战的深厚潜力。因此,“最后胜利是中国的”^{[2]P442-443},“抗日战争是持久战”^{[2]P443},这一论断打破了“亡国论”的阴霾和“速胜论”的幻想,让人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二)辩证分析敌我力量:基于矛盾转化的战术原则创新

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力量的辩证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基于矛盾转化的战术原则创新,构建了以弱胜强的战术体系,实现了战略与战术的辩证统一,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指导。

1. 军事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的战术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通过主动创造局部优势实现矛盾转化。他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2]P487}这种将主观能动性 with 客观规律性相结合的思维,集中体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6]P177}的指导原则中。在作战形式的运用上,毛泽东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2]P500}的战略方针,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与传统游击战不同,他赋予游击战以明确的战略任务:破坏敌人后方交通、摧毁伪政权、动员群众参战、为正规军创造战机等。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迅速转入敌后,在华北建立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根据地,通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7]P104}的十六字诀,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以“军事—政治—群众”三位一体的战略思维,构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独特军事体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游击战争实践提供了经典范例。

2. 以弱胜强的战术体系建构

针对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特点,毛泽东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8]P93-94}的非对称作战原则,构建了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战术体系。灵活的兵力运用策略最大限度发挥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毛泽东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9]P1197},即使在总体兵力劣势下,也能通过战役战斗的优势形成局部歼灭战。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役,八路军以3个团的兵力伏击日军第5师团辎重部队,歼灭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战术精髓在于利用地形优势、隐蔽接敌、分割包围,体现了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有机结合。敌后战场的开辟则从战略层面改变了战争态势。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中国抗日战争以弱胜强战术体系的一大创举。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深入日军占领区,在敌人后方建立起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与正面战场相互呼应的第二战场。这些根据地以农村为依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群众进行生产和武装斗争,构建起相对独立的抗战体系,使中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找到了持久抗战并最终取胜的有效途径。

3. 战略与战术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始终强调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术上的外线作战的辩证统一,将宏观战略与微观战术有机结合,使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扬长避短、化被动为主动。他指出:“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2]P408}毛泽东坚持持久战和速决战的辩证统一。基于对中日国情和战争规律的深刻分析,毛泽东在战略上提出“持

久战”,避免了“速胜论”的盲目乐观与“亡国论”的消极悲观;在战术上,则采取“速决战”原则,八路军、新四军以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灵活战法,对日军进行小规模、高频率的袭击,有效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毛泽东坚持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辩证统一。众多敌后抗日根据地,将战场延伸至日军侧翼和后方,从战略内线防御的角度看,敌后抗日根据地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吸引了日军部分兵力,缓解了内线作战的困境;从战术外线作战角度,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动出击,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为整体战局的扭转创造了条件。

(三) 维护统一战线:基于政治智慧的主动权把控

毛泽东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框架,实现了对统一战线主动权的战略把控,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局势下的政治成熟,更彰显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造力。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创立

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7]P153}这一论述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束缚,将统一战线范围扩展到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2]P751}的策略方针。发展进步势力即壮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争取中间势力即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通过政治协商、利益协调使其支持抗战;孤立顽固势力即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进一步明确:“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2]P745},为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2. 独立自主原则的坚守与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

全民族力量抵御外侮的关键纽带。同时,毛泽东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深刻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并为此作出了诸多努力。在思想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的独立性,坚决抵制国民党污蔑、诋毁的图谋。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2]P540},反对“溶共”图谋。在政治上,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0]P455}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11]P86}。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政治路线自主权,反对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根据地的限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组织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2]P547},强调“必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必须有一个完全执行这个纲领的政府和军队”^{[2]P388}。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守与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实现了与各抗日力量的有效合作,又确保了自身的独立性与发展壮大。

3. 国际统一战线的拓展与运用

毛泽东始终将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争取国际支持,构建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他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12]P633}毛泽东积极倡导与推动与苏联的联合,1935年的《抗日救国宣言》就已明确提出,要“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2]P347}。毛泽东多次通过共产国际、苏联驻华使馆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苏方表达合作意愿,苏联也在抗日战争期间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火贷款,派遣了数千名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员。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减轻了中国战场的压力,加速了日本投降进程。在对美外交中,毛泽东采取灵活策略,既争取美国的物质援助,又警惕其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1944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提出中国和美国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的主张,促成了美军对八路军的情报合作与有限物资援助。同时,针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也时刻保持警醒,并始终认为:“不能说凡是

政府愿意的,就不是干涉内政。”^{[8]P381}此外,毛泽东还主张联合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通过优待俘虏、建立反战组织等方式,瓦解日军的士气,从内部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力量。

二、理论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应时代课题

面对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以非凡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刻把握时代课题,在理论创新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回应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问题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历史定位的清晰界定、基本纲领的系统构建与实践当中的有效落实,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推动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1. 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历史定位

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和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定位进行了系统阐述,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新民主主义论》演讲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2]P665}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分析,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反帝反封建,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3]P1056}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架构,更为战后中国的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

2. 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纲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新民

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2]P675};在经济上,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同时允许“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2]P678}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在文化上,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P708}。这些纲领的提出,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他还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形态,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为中国革命的阶段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正如他在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指出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2]P666}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行动实践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框架,还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将其落到实处。在政治领域,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政权机关三分之一,最大程度团结了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和抗日党派,产生了强大政治聚合效应。在经济领域,1942年初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既赢得农民支持,又争取地主阶级对抗日的支持,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明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自由贸易、合理税收等经济政策,促进边区经济发展,减轻民众负担。在文化领域,边区通过创办学校、发行报刊、组织文艺团体等方式,推动文化普及和民众教育,为革命凝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法制领域,边区成立法令审查委员会、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等相关委员会,创制上千件法律法规,保障了边区社会秩序稳定,维护了人民合法权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法制层面的重要实践。

(二) 丰富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与战术

毛泽东通过对战略防御与主动出击的辩证运用、军事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协同推进,以及战略全局综合把控与局部战术灵活调整等多方面的实践

与探索,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战术指导,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

1. 辩证运用战略防御与主动出击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日本凭借其先进的军事装备和长期的战争准备,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占据明显优势。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精准把握战争态势,明确指出中国要在战略上应采取防御姿态。这种防御并非消极被动的挨打,而是蕴含深远战略考量的积极防御,“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7]P206}。他主张借助中国广袤的国土空间,以战略防御来迟滞日军的进攻步伐,在运动与周旋中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我方争取宝贵时间,以实现力量积累和战略调整。同时,毛泽东积极倡导在局部战场适时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主动攻击,以打乱日军进攻节奏,提升我方士气,并在实战中积累作战经验,锻炼部队作战能力。毛泽东将战略防御与主动出击辩证统一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中关于战争态势分析和作战方式选择理论的创造性运用。这种辩证的战略思维,既避免了因盲目进攻而导致的力量损耗,又防止了因过度防御而陷入被动挨打局面,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实施指明了正确方向,使中国军队在战争初期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逐步积累力量,为后续的战略转变创造条件。

2. 协同推进军事斗争与经济斗争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战争绝非单纯的军事力量对抗,而是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其中,经济因素起着基础性、支撑性的关键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滞后,物资匮乏,而日本则拥有相对发达的工业体系和较为充足的物资储备。面对这一巨大经济差距,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军事斗争与经济斗争协同推进,以保障抗战的持久进行。毛泽东积极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军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粮食供应。同时,积极扶持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发展,努力生产武器弹药、被服等各类军用物资,极大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独立性与军事保障能力,正如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

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3]P891}将军事斗争与经济斗争协同推进的思想,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洞察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创新发展,打破了传统军事理论中单纯聚焦军事对抗的狭隘局限,将经济因素全面纳入战争的整体战略考量范畴,构建起一种全面、系统的战争指导思想,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综合把控战略全局与灵活调整局部战术

抗日战争规模宏大、局势复杂,涉及广袤的地域空间与众多的作战力量。毛泽东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整个抗战局势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精准把握。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7]P175}在牢牢把握战略全局的同时,毛泽东着重强调要依据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调整局部战术。他深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各地的地理环境、敌我力量对比等因素千差万别,因此绝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战术模式,要灵活调整局部战术,才能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毛泽东对战略全局综合把控与对局部战术灵活调整相结合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与部分辩证统一的原理,使中国军队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始终保持主动,有效打击敌人,持续推动抗日战争朝着胜利的方向稳步迈进。

(三) 构建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确保党的先进性与战斗力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多方面主动出击,构建起全面系统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为党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环境中保持先进性与战斗力提供了坚实保障,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不断前进。

1. 加强思想建设,筑牢党的先进性根基

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3]P375}。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党员成分复杂、思想多元的现实情况,他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并领导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和培训机构,组织党员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员干部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13]P812}整风运动使全党在思想上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得到极大提高,党内的不良思想作风得到有效纠正,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2. 增强组织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将其贯穿于党的组织建设全过程。他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7]P278}通过发扬党内民主,鼓励党员积极参与党的决策和事务管理,充分发挥了党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又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意志和行动的一致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P526}抗日战争时期,党面临着艰巨的抗战任务和复杂的斗争环境,迫切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来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战。为此,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注重从抗战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通过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选派干部到前线和基层工作等方式,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军事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对干部的考核与监督,确保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抗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党领导抗战的中坚力量,为党的组织建设和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3. 强化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制

定符合国情的战略策略和政策措施,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贴近战争实际,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密切联系的作风强调党要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抗日洪流,使党获得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纯洁党的队伍的有效途径,鼓励党员干部勇于揭露和纠正自身缺点错误,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消除党内的不良倾向和腐败现象,增强党的团结和凝聚力,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创造力,确保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三大作风建设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成为党凝聚抗战力量的核心纽带。

三、实践路径:以群众路线开辟胜利之路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凭借卓越的历史主动精神,在群众路线实践路径上进行了艰辛探索,将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启了以群众路线开辟胜利之路的伟大征程,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的壮丽篇章。

(一)发动人民战争:群众路线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建

中国共产党通过洞察抗战形势确立人民战争战略,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以及组织和武装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一系列战略举措,成功发动了人民战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1. 洞察抗战形势,确立人民战争战略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P511}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准确把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关键,指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他呼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为党在新形势下的行动指明了方向。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

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等十大主张,核心目标就是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毛泽东强调要广泛动员群众,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P480}。在这一思想引领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全力支援前线,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

2. 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

为实现人民战争的战略构想,毛泽东积极推动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都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2]P419}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下,八路军115师挺进晋察冀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此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苏中、苏北等众多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成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为人民战争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依托。根据地军民紧密结合,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游击战争形式,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这些游击战争形式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创造力,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3. 组织和武装群众,壮大抗日力量

在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注重组织和武装群众,壮大抗日力量。他强调:“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14]P45}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如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这些群众组织在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组织生产、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救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组织农民参加抗日武装,保卫家乡。工救会组织工人开展生

产自救,为抗战提供物资支持,同时组织工人武装,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妇救会组织妇女为战士们做军鞋、送情报、护理伤员等,为抗战做出了伟大贡献。青救会组织青年参加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后备力量。根据地还注重武装群众,建立了民兵、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这些群众武装组织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保卫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群众路线与经济封锁的实践破解

面对日军残酷进攻与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双重困境,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意义深远的大生产运动,成功破解了经济难题,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彰显了群众路线的强大力量。

1. 克服经济困境,开展生产自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国民党顽固派也对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甚至陷入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3]P892}的危机,严重威胁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和抗战事业的推进。面对这一艰难局面,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3]P460}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5]P633}的号召。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军各级军事、政治首长、各级政治部主任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16]P46}。为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中央领导同志纷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附近开垦菜地,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朱德组织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门前开荒。他们的行动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带动大生产运动的热潮。

2. 制定政策措施,推动生产发展

为确保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农业生产方面,采取了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等措施。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7]P124}的财

政经济总方针,结合当时“奖励移民开荒”^{[18]P242}的思路,边区政府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移民垦殖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把奖励移民难民开荒生产与开展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对于吸引人口迁入、开发边区荒地、增加粮食产量和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工业生产方面,采取了发展公营工业、鼓励私营工业、开展手工业生产等措施。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纺织厂、造纸厂、兵工厂、被服厂等公营企业,生产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和武器弹药,满足了边区军民的基本需求。同时,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此外,边区还大力开展手工业生产,组织群众从事纺织、编织、印染、制革等手工业活动。手工业生产在满足边区军民生活需要的同时,还为边区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3. 军民团结协作,实现自给自足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军民团结协作,共同克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战士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垦荒地。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克服了重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奇迹。“南泥湾曾是荒无人烟的地方,那里鸟兽纵横……但是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19]同时,鼓励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伐,针对边区巡视员提出的驻边部队砍伐群众树木的现象,边区强调:“凡我部队,对于树株应当保护之不暇,岂忍任意随地滥伐,据报前情,合行令仰该司令员通令所属严行禁止为要。”^{[20]P206}。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使根据地克服了经济困难,实现了自给自足,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且增强了军民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战士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群众的伟大,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言:“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13]P1107}

(三)推动文化动员:群众路线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转化

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战略眼光,将文化动员上升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运用群众路线推动了文化动员,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时代性转化,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 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制定文化工作方针

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 文化建设与抗战紧密相连。日本侵略者实施文化毁灭与奴化政策, 妄图磨灭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抗战, 团结爱国文化人士, 以笔为戈, 开展全方位文化斗争。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要为抗战服务。1942年5月,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3]P863}这就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 了解群众的需求和生活, 创作出反映人民群众抗战生活、激发人民群众抗战热情的优秀作品, 从而凝聚起全民族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为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意志, 使民众更加坚定地投身于抗战事业; 而抗战的伟大实践又为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舞台, 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创新。

2. 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激发抗战热情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宣传活动, 不仅是军事斗争的补充, 更是民族精神的觉醒。在毛泽东文化工作方针的指导下, 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战的意义和形势, 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根据地创办了大量报刊杂志, 如《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等, 及时报道抗战最新消息,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 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 许多反映边区军民抗战生活的通讯、报告文学和诗歌等, 如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 也生动展现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和生活风貌,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此外, 根据地还组织各种文艺演出团体, 如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等, 深入农村、部队进行演出。演出的文艺作品包括许多反映抗战题材的贴近生活、通俗易懂戏剧、歌曲、舞蹈等, 如《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等, 以生动的形式和深刻的内涵, 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存亡紧紧相连, 为抗日战争汇聚起了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3. 发展教育事业, 培养抗战人才

为培养抗战所需人才, 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抗日根据地, 党领导创办了许多学校, 包括干部学校、普通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等。干部学校主要培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军事干部, 如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抗日军政大学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21]P120}为教育方针, 为党和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陕北公学则以培养抗日救亡干部为宗旨, 为抗战输送了大量的人才。鲁迅艺术学院培养了许多文艺人才, 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普通学校主要面向广大青少年学生, 传授文化知识和抗战思想。社会教育机构则主要面向广大群众, 开展扫盲教育和抗战宣传。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事业,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通过知识的传播、精神的培育, 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 增强了民族意识, 将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这种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 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争取胜利的强大动力, 也为中国在战后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抗日战争是一段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抵御外侮的悲壮历程, 它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也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 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 不仅体现在对战争表象的敏锐观察上, 更体现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层把握上; 不仅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战术应对上, 更体现在对全局战略的长远谋划上。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的本质, 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勇气, 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价值立场, 是在复杂环境中把握机遇、创造条件的实践智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深入学习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 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把握历史方位、增强历史主动, 对于“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1], 均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12-27.

-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 [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1]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40年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
- [1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18]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9]解放日报.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N].解放日报,1942-12-12.
- [20]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 [21]肖一平,等.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1937—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On MAO Zedong's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JI Chunfang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great anti-aggression war of the Chinese nation against Japan, which determined the fate of the nation, MAO Zedong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historical initiative through profound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In holistic orchestration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the breakthrough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itiative-driven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paths, he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layout of the Eastern battlefield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In terms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MAO Zedong resolved the war predicament with the theory of protracted war;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AO Zedong responded to the contemporary issues by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n terms of the practical path, MAO Zedong pioneered the path to victory with mass line.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demonstrated by MAO Zedo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a model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t hold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nhance historical initiative.

Key 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O Zedong;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责任编辑:肖文初)